**教职工政治学习参考资料**

**（2016年第6期）**

**苏州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2016年5月23 日**

**● 学习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宣传

**● “时代楷模”先进事迹**

**（一）新村力量，从石头缝中坚强迸发——时代楷模王家元同志先进事迹(上)………………………………………………1**

**（二）“春风之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传唱——时代楷模王家元同志先进事迹（下）…………………………………………4**

**（三）时代楷模”崔根良：坚持自主创新的党员企业家………8**

**（四）多往群众身边跑——追记山西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原所长李培斌……………………………………………..……….12**

**（五）黄志丽：法律大地上的守望者……………………………14**

**（六）44年把百姓的事刻在心上——追记“时代楷模”燕振昌….………………………………………………….…….18**

**（七）尕布龙：“牧民省长”时代楷模…………………..………23**

**新村力量，从石头缝中坚强迸发**

**——时代楷模王家元同志先进事迹(上)**

4月的筠连，春风宜人。

　　从一条约5米宽的水泥村道蜿蜒而上，路两边，喀斯特地貌陡峭险峻。这片本来寸草不生的“石漠”，在筠连县腾达镇春风村硬是被栽满了李子树。暮春时节，漫山遍野一片碧绿，果挂枝头。让石头“开花结果”的人，叫王家元，春风村党支部书记。

　　12年，春风村从一个土地贫瘠、交通落后、人心涣散的困难村，蜕变为无一贫困户、无一上访户、无一违法犯罪的“三无村”，成为四川省脱贫攻坚的一面旗帜。

　　在村里，老人叫这个“扛旗帜”的人为“家元”，同辈和后辈则喊他“三哥”。

　　眼前的王家元，个子不高、一头黑发、壮实精神。“啥子一头黑发哟，那是刚刚在理发店染的，他头发早就白了。”一旁的村民打趣说。又有人说，“三哥”头上的白发，就像那满山洁白的李花，从石头缝里迸发出力量和美。

**拼出一条路**

　　“去年我的‘李子王’，卖85元一颗。”村民刘国彬的农家乐“红李子大王”开在水泥村道边。

　　这条路，是春风村和王家元前行路上梦开始的地方。

　　“人这一辈子，总该干点什么。”2004年，38岁的王家元陷入了思考。那时的王家元，意气风发。16岁就外出闯荡世界，兄弟三人做布匹生意，年收入10万元以上。他在筠连县城买上了130平方米的大房子，在春风村附近开了采石场，日子很红火。

　　回到村里，西装革履的王家元被村民上下打量得浑身不自在。“家元，你倒是找到钱了，我们的穷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哦。”乡亲们的话，让王家元心里很不是滋味。

　　彼时的春风村，三个村民小组，一个乱石遍布，只能种点玉米和红薯，另外两个都是荒芜的山坡地，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不到1800元。更让王家元纠结的是，村口修了一半就荒废的公路。那条路是王家元的大哥王中元带领大伙儿修的，没想到路才开了个头，时任村主任的王中元就因公牺牲。

　　春风村人穷够了。2004年11月，村里换届选举，王家元高票当选村主任。

　　家里人齐反对。妻子廖运兰说，村主任“年薪”仅1800元，还不够烟钱和油钱。

　　王家元哭了。他来到大哥坟头，想着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大哥没有完成的愿望，想来想去，他打定主意，“这村主任，我干！”

　　在第一次村民大会上，王家元放了狠话：“如果任期内修不通出村公路，我就下课！”

　　但修路没那么容易。很多村民包包里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有的村民还不理解，“修这个路就是为了他们家买汽车。”“我是想让大家都能买汽车！”王家元火了。他从家里拿了2000元垫上，“修路需要石材，尽管到我采石场拖，不要一分钱。”之后，买筑路工具，买水泥砂石，买雷管炸药，王家元一共花掉家里10多万元。

　　当个村主任还倒贴钱，廖运兰心里不爽。

　　为了躲避妻子的唠叨，王家元索性搬到工地上。孩子一个月没见到爸爸了，廖运兰就趁周末牵着孩子去工地找他。一看，气全消了。只见王家元抡着铁锤，一锤锤敲打着坚硬的石头，身上的衬衫已经湿透。村民们说，他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那段时间不敢跟他握手，他手上的老茧‘割’人。”腾达镇党委书记石均说，“他是吃得亏、打得堆的群众贴心人。”

　　群众的心被焐热了。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十二三岁的孩童，都到工地上帮忙。2005年3月，春风村终于有了一条长4公里的出村通道。

**种好一棵树**

　　路修好了，村民笑嘻嘻的。但在外打拼多年的王家元深知，没有产业，一切都是“空了吹”。

　　春风村尝试过种海椒、火葱、烟叶等，拉到附近的宜宾、自贡等地去卖，几毛钱一斤都卖不脱。

　　搞产业，不能蛮干。王家元和村民一样样梳理，发现不少人房前屋后都种李子树。“有人专门开车来买，车胎都碾爆了也觉得值。”王家元眼睛一亮，找来市县农业专家“会诊”，发现当地岩缝中的黄泥土特别适合种李子。把账一算，种粮食每亩只能收成三四百元，种李子能达到5000元。“那就种李子。”王家元说。第一次社员大会就炸开了锅。“卖不脱，你负责？”“不种粮食，我到你家吃饭？”

　　“你来吃好了。”把话顶了回去，王家元便发动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率先种起李子。

　　满山的大石头难不倒春风村人。他们肩挑手扛，从20公里外运来泥土，一点点填在石头缝隙里，种下李子树苗。李子熟了，价格一路攀升。没种李子树的村民坐不住了。

　　“总算把你们摇醒了。”王家元说。短短几年，春风村就种植了121公顷李子树。每到3月，怪石林立的石头山开满了雪白的李花。王家元顺势号召村民办起了李花节、品果节，开起了农家乐。

　　刚开始办农家乐时，村民胡怀彬连菜都不会炒。遇上第一拨客人对菜不满意，他气哄哄地说，“你们到别家去吃。”眼看要闹僵了，王家元一路小跑赶了来，摘下胡怀彬的围裙，抄起了锅铲，“来来来，我教你炒菜。”村里人都知道，“三哥”做菜手艺是一绝。

　　胡怀银也想开农家乐。翻修了自家房子之后，没钱了，门口的院子还是稀泥巴。“三哥，帮下我嘛。”“没问题。”王家元立马找了十来个人，垫上几千元钱。一天一夜之后，一个敞亮的大院子出现在胡怀银眼前。

　　如今，春风村的李子“俏”得很，每公斤最高要卖到40元。往往李花开的时候，整棵树的李子就被预订了。人们都说，春风村的李子成了“期货”。

　　种了3.33公顷李子的胡怀彬，仅卖李子的收入就达到10万元以上，一家人再也不用睡在猪圈里；30多岁还没讨上媳妇的胡怀银，在自己的农家乐收获了爱情。

　　王家元头发白了，心里却很美，“看着群众富起来，是一个村干部最大的满足。”

**盘活一方土**

　　春风村的121公顷李子树，集中在春风组。看着春风组的人腰包鼓了，另外两个组的人急了。有人追着王家元，“我们也要种李子”。“你们那儿土壤不适合，不能照搬。”几经研究，村委会为中沙、龙塘两个组分别确定了花卉、茶叶两个产业。

　　听说春风村想流转土地搞花卉产业，30公里外高县的业主周波找上门来，转了一圈后开出价码：“租金50元一亩，多一分钱不要。”

　　王家元向当时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石均汇报，被石均骂了一顿，“这么便宜？不准租！”王家元没吭声。

　　几天后，王家元再次找到石均，拿出一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全是中沙组村民的签名，还按上了手印。“租不租地，我让大家自己决定。”石均找不到话反驳了。

　　签合同的时候，周波觉得自己赚了。没想到王家元话锋一转，“你用工必须优先用我们村上的人，这一条没商量。”

　　20公顷地种上了花卉苗木。王家元没少操心，铺路、找水，皮肤都晒破了。有一天晚上，周波运送苗木的货车翻了，王家元带了几十个村民，冒着暴雨，硬是用肩膀和双手，把货车拉了出来。

　　从那以后，周波也叫王家元“三哥”。但遇上和村民利益相关的事，王家元可不和他讲“哥俩好”。

　　有一次，王家元到成都周边的温江、郫县考察花卉产业，发现一棵树居然能卖到上千元。当周波想再次流转土地时，王家元不干了。“我们的村民也要当老板。”于是，中沙组形成了土地入股的发展模式。公司出苗子、出技术、负责销售；农民出土地、出劳力。所得的利润，双方按4:6分成，农民占大头。

　　来龙塘组发展茶叶加工的方元兴，也尝过王家元的“厉害”。

　　那时候，方元兴的加工厂在村里一枝独秀，连续几年的茶叶收购价格都维持在每公斤80元，“能不能给村民涨点价？”“不行。”方元兴一口浙江普通话，语气虽软，态度却硬。

　　王家元很郁闷，他爬上村里最高处的那个凉亭，灌两口烧酒、吼一嗓子山歌，一下有主意了。

　　下了山，王家元立刻发动村里人跟认识的江浙朋友群发短信。内容很简单：春风村有千亩茶园，速来。更多的业主来了，春风村一下子多了三家茶叶加工厂。这下，四家厂子开始“打架”。

　　王家元乐了：这家开价40元，那家就涨到45元，另外一家赶紧喊出50元……现在，春风村的茶叶收购价达到每公斤140元。三大产业发力，2015年，春风村人均纯收入实现1.92万元，高出全县平均水平7463元。

王家元笑了：能有今天，是因为春风人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春风之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传唱**

**——时代楷模王家元同志先进事迹（下）**

“叮铃铃……”4月12日，宜宾市筠连县腾达镇春风村，村委会办公室电话铃声响起，打来电话的是泸州的一家旅行社。王家元笑容满面，与这家旅行社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春风村帐篷节正在紧锣密鼓地敲定细节。

　　城里人要来村里搭100多顶帐篷，捉萤火虫、数星星，这对村民们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不过，现在的春风人，即便是再新鲜的事，也不觉得惊讶。他们憋足一股劲，“只要三哥说得对，我们捋起袖子跟着干。”

　　春风村已脱贫，但要防止返贫，更要奔向全面小康；大家伙儿在物质上富起来了，精神上也不能“掉链子”……这些年，三哥王家元想得多，也做得多。

　　党的十八大召开那一年，王家元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回到村里，王家元拿出一系列举措：产业提质增效、邻村抱团发展、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改造村风民俗……

　　让春风村再攀新峰，王家元誓把“春风之歌”唱得更响亮。

**产业成链**

　　春风村三大产业，发展最艰难的是茶叶。

　　当年，村民没有钱买茶苗，王家元好说歹说，让父亲拿出哥哥的3万元抚恤金，把茶苗送到大伙儿手上。没想到几个月后一看，不少村民偷偷把茶苗扔在了林子里。

　　王家元心里又急又痛，同时也意识到，“老百姓有后顾之忧。”

　　后顾之忧真的来了。第二年茶叶采摘，村民卖不出去。几个人挑了几筐鲜叶，怒气冲冲地冲到村委会办公室，拍着桌子吼，“三哥，茶叶是你叫我们种的，你看现在咋办？”

　　无奈之下，王家元和几个村干部垫钱把茶叶买下来，晚上再摸黑骑着摩托车到筠连、高县等地叫卖。听说这事，副镇长石均找到王家元：“你被人告了，说你白天当村干部，晚上倒卖茶叶赚钱！”

　　这次教训让王家元再次意识到，光埋头种地不行，必须放眼看市场，建设自己的茶叶加工基地。

　　借智借力，目前，春风村已有4家茶叶加工企业，茶叶种植面积发展到213公顷。茶叶再也不愁卖了。上好的“乌牛早”，0.06公顷的茶叶纯利润能达到6000元以上。

　　2012年，作为党的十八大代表，王家元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些话语让王家元热血沸腾。“奔全面小康，春风村800多个村民一个也不能落下。”回到村里，王家元立即召集村两委开会，商量发展大计。“江浙一带的茶园，每亩产值能达两三万元，为啥？因为人家有品牌。”村里申请注册了“春风雾尖”龙井茶商标，王家元立刻找来方元兴等茶厂业主。

　　“这个商标，你们拿去用，不给钱。”方元兴听得瞪大了眼，心想，“你傻不傻啊？”没想到王家元的算盘打得更好，“让这个商标跟随你们去市场上摸爬滚打，等到知名度打出来了，我可就要跟你们谈价钱了。”

　　不能小富即安。这些年，王家元没闲着：李子、花卉、茶叶三个产业已成型，但仍有提升空间，李子下面套种茶叶，花卉下面搞养殖，三个产业你追我赶；李子、茶叶都要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种植管理，打造绿色产品和有机茶园；要在春风村建一个农产品深加工厂，让游客把欢乐带走，把钞票留下……

　　不过，最近最让王家元操心的，还是如何发展乡村旅游。“一方面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好田园风光；另外正在和高县、珙县，乃至自贡、泸州等地的景区、旅行社对接，搭建一个共生、互推的平台。”

**抱团发展**

　　2014年，王家元干了一件事，让村民一片哗然。

　　王家元向镇党委推荐，让村里最得力的村干部刘炳付，到邻近的千秋村任党支部书记。那时的千秋村，和多年前的春风村一样，交通不便、产业疲软。

　　春风村人心里很不爽。“把我们村里的能人送给别人家，你就不怕我们村受影响？”

　　王家元不为所动。“一个地方要发展，必须有一个能干的带头人。致富不忘相邻，我们不帮谁帮？”

　　带着跟王家元学到的真本事，来到千秋村的刘炳付不负众望，引进茶叶企业开拓茶园200公顷，带动村民自种茶叶330多公顷。仅今年春茶，每户就增收上万元。千秋人说，“春风村送来了及时雨。”

　　带动周边落后村共享“春风”，早就萦绕在王家元心头。一个春风村“孵化”出N个春风村，王家元向镇党委提出了强村带弱村、产业联合发展的建议。

　　之后，一个名为“春风综合体”的规划出炉。按照规划，春风村与相邻的向阳村、水茨村、千秋村、冒水村组成“春风综合体”，就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新村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共同推进，让财富的种子遍地开花。

　　挑战不小：“春风综合体”共有5个村、37个组、2026户、8346人，从人口数量上来说，是春风村的十倍。

　　综合体刚刚建起，县上安排其他4个村的村支书、村主任，“贴身”观察学习王家元。“咋个和老百姓打交道？有些人就是犟得很。”“当村干部不能骄傲，老百姓骂你一顿都不要有怨言。但原则问题还是要坚持。”“产业该咋个发展？我们也一起种李子、种茶叶？”“那不一定。各人要看各人的实际情况。”

　　5个村“联姻”了。在镇党委政府的统筹下，综合体内水、电、路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实现综合体内村村通水泥路、组组通公路。在产业发展上，花卉产业已向冒水村延伸，茶叶产业已向千秋村拓展。串起5个村的旅游环线，也正在打通。

　　向阳村有些特殊。在确定产业时，王家元一次次地找该村支书唐守华谈心。“你们村的土地不太适合种茶树，但有大片的黑麦草，正好发展肉牛养殖。”如今，向阳村引进了川南肉牛交易市场，买卖不愁。

　　王家元出名了，宜宾提出要打造1000个春风村。筠连县243个村的村干部都来学习。

**新风扑面**

　　春风村日子好过了，村口那棵高大的黄桷树，却成了王家元的“心病”。

　　这棵树和共和国同年，盘根错节、枝繁叶茂。不少村民把它奉为“神树”，拴上红丝带、天天烧香跪拜。与此同时，富起来的村里，响起了麻将声。

　　“这不对劲啊。”王家元召集村民开会。

　　“拜树干啥？我们脱贫致富，不靠天、不信命，靠的是自己抛洒的汗水和勤劳的双手。”王家元叫人撤去了树上的红布，给树命名为“建国树”，大家在树下讨论出村规民约，总结“春风精神”“就是不给封建迷信生存空间。”

　　爱打麻将的胡怀银，被王家元狠狠训了一顿。“摘牌、降星！”根据村规民约，胡怀银的二星农家乐被降为一星。

　　不叫人打麻将，总得给村民找点事干。王家元召集党员和村民代表开会，确定了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735”规划：“7”，即农民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农民健身中心等7个阵地；“3”，即春风农民文艺演出队、春风志愿服务队伍、春风乡贤队伍“三支队伍”；“5”，是每年在村里组织开展最美春风赛、最美春风行、最美春风村、最美春风赞、最美春风人等“五项活动”。

　　村民胡怀彬连续两届当选“最美春风人”。“村里的蓄水池墙体裂缝，装不了水。”“村里的卫生需要有人维护。”“能传授李树的种植技术、技巧的，能不能到其他地方去传帮带一下？”面对村里村外的一些事，胡怀彬选择：干。

　　也有人懒，天天喝酒睡觉。王家元毛了，“谁要再拿酒给他喝，我找你们麻烦！”

　　也有人横。村里帮他修新房，却不领情。王家元骂过了他，还是帮他在县城找工作。

　　在春风村新建的三块田聚居点上，每家每户门前都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自己的“家训”。王家元家的那块，有一句是，“肩担道义、胸怀天下”。

　　这些年来，两鬓斑白的王家元，有时也觉得力不从心。“电脑、网络、微信什么的，我玩不转。”知道自己的软肋，王家元从2007年当选村支书起，就有心培养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

　　“我们春风村的干部，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王家元说，他设置了一条“硬杠子”，候选人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产业，“比老百姓还穷，你拿什么带动大家？”

　　现在，每年春风村都会自发组织一场“春晚”。晚会的压轴大戏，是王家元演唱“春风之歌”——《槐花几时开》。据说，这首歌他会川剧版、通俗版、现代版、山歌版4个版本。歌声结束时，数百村民一拥而上，欢呼着把他们的三哥接连抛向空中。那一幕，格外动人。

王家元今年49岁了，他内心依然有勇气、有梦想，带着春风人去拼、去闯。他希望，当老了的时候，拄着拐杖，再次走遍春风村的山山水水，看看满山的李花，看看那气派的厂房，还有一张笑脸在亲切地喊，“三哥”。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时代楷模”崔根良：坚持自主创新的党员企业家**

　　从几百平的破旧厂房发展为一家连续11年入围中国500强的知名企业，成为中国光纤通信的最大系统集成商，他勇立潮头，从无到有，完成了艰苦创业到卓越创新的实践。

　　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生产型企业到无数次地打破国际垄断的研发型企业，跻身全球光纤通信前三甲，赢得国际话语权，他坚持创新，从低端到高端，完成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

　　从成立慈善基金会到公益慈善累计捐赠超4.8亿元，慈善事业运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他始终奉行“真善不为人知”的理念，完成了企业责任担负到社会责任担当的升华。

　　崔根良，土生土长的苏州吴江人，身材敦实，步伐矫健，平凡的外表下胸怀着一颗充满担当的“中国心”。在一般人眼里，崔根良是中国“线缆航母”亨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是全国人大代表、是杰出的民营企业家，然而崔根良却总是很光荣地说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30多年来，崔根良以爱党爱国为信念，以产业报国为己任，所创办的亨通集团时刻紧跟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创业到创新，从制造到创造，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近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光荣授予崔根良江苏“时代楷模”称号。

**有一种力量叫拼搏**

**新常态下逆势而上 艰辛创业百亿级跳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崔根良从部队退伍后投身商海，在浙江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正当他在异乡蒸蒸日上之时，老家吴江七都镇的党委书记“三顾茅庐”邀请崔根良回乡，担任濒临倒闭的吴江七都丝织服装厂厂长。崔根良考虑再三，婉言谢绝了浙江老板的挽留，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党员就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返回家乡，他一头扎进丝织服装厂里，与员工们一起奋战在生产第一线，24小时连轴转；还常常亲自外出跑供销，一走就是两三个星期，奔波于几个省之间。几个月后丝织服装厂就扭亏为盈，净挣利润60多万元。

　　初战告捷，正当准备乘胜前进的时候，镇党委决定调崔根良到镇上当时投资最大但亏损严重的乳胶手套厂当厂长。他又二话不说来到乳胶手套厂，和技术人员一道研究产品，在业内到处打听寻找能人，陪着工程师几天几夜地研修设备……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再次扭转乾坤。可好景不长，一场国际经济危机与市场整令乳胶手套厂倒闭了。

　　崔根良陷入了沉思，下一步的出路在哪里？曾经的通信兵经历让他敏锐地察觉到，通信行业大有可为！崔根良说服了省通信电缆厂，在七都成立了吴江分厂。面对长着一人高杂草的破旧农机厂房、几台老掉牙的机器设备、一台报废的铁炉、120万元债务，工人们都陷入了迷茫……

　　崔根良是一个冷静的掌舵者，他相信自己赶上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代，鼓励着员工只要找准方向，一定有机会。一招“借鸡生蛋”，当年就实现利税几十万元。随后，他找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合作，“借梯登高”，解决了技术人才问题，填补了江苏省光缆项目的空白。紧接着，他又找到日本企业合资，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实现了“借船出海”。到1995年底，亨通通信电缆产销量已跃居全国同行第一，仅用了5年时间，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亨通就站到行业最高点。

　　凭借骨子里永不满足的雄心与从无到有的执着，崔根良带队先后攻下电缆、光缆、光纤、光棒，直至今日拥有完整产业链，把亨通经营成如今拥有45家子公司、2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在全国10省市和全球亚、非、欧、美等地区设立产业基地，市场覆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光纤通信、智能电网领域规模最大的系统集成商和网络服务商。由此亨通年销售额连续创出百亿级的跳跃，2007年完成100亿元，2011年达到200亿元，2013年突破300亿元，2015年达到483亿元。

　　**有一种精神叫突破**

**创新实干研发光棒 打破垄断为国争光**

　　走进亨通光通信产业园的光棒研制车间，一根根光亮剔透的“玻璃棒”吊在拉丝塔上，棒身上端呈柱形，下端呈锥形，末端拉出眯眼才见的细丝。

　　“这是整个光通信产业链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产品，因为这根‘玻璃棒’，我们亨通一战成名！”尽管已过去很多年，但提起光棒在亨通成功研发的故事，亨通研发中心总经理马建强情绪激动，“太难了，当崔总提出自主研发光棒，立即遭到一片反对声。”在项目论证会上，专家们毫不客气的问崔根良：上光纤预制棒的技术难度比制造光纤难度更大，在中国，国字头的大企业、大研究所已经研制了20多年光纤拉丝技术和光棒制造技术，都没有成功，你一个乡镇企业家是不是心太大了？

　　崔根良说：不是“心大”，是为了“两股气”。一个是骨气，我们中国人做人做事就是要有骨气，总不能永远看外国人的脸色搞生产，永远被别人压着！另一个是争气，要为亨通争气，要为中国光纤光缆制造业争气，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创造自己的核心技术，完成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

　　在亨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里程碑上，深深地镌刻着：光纤预制棒——自主研发——投资6亿——耗时3年。1500多个日日夜夜，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研发人员向他报告进展或失败情况，他总是说不急不急，要精准、慢慢来。

　　2010年8月7日，亨通自主创新研发的光纤预制棒终于成功面世。崔根良喜极而泣地说，每天“烧钱”50多万，连续“烧”三年啊！我的心能不急吗？能不疼吗？可是，这是搞科学试验，是攀登科技高峰，不能因为我的情绪，影响科研人员！至此，亨通完全掌握了光纤、光棒的核心技术，奠定了中国在世界光通信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在崔根良的带动下，亨通集团紧跟时代形势、全力服务国家战略。开发的国际领先水平的最大容量、最快速率、最低损耗光纤；自主研发的航空航天、军工装备特种光纤、光纤导航等系统，一次次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在神舟九号、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任务中，两次受到解放军总装备部的嘉奖；先后承担了国家863、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科技项目190多项；拿到了2000多项国家专利、主持或参与150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制订……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接见崔根良代表时，得知亨通产品用在埃塞俄比亚轨交线项目时，高兴地鼓励：“高铁代表高技术，还要继续努力！”

　　**有一种热爱叫忠党**

**凝心聚力产业报国 经济党建并蒂花开**

　　位于亨通集团总部六楼的亨通党校，是吴江首家民企党校。走进去，随手点开大屏幕上远程党建平台“光电驿站”，顿时整个集团各支部党建联络员每月考核得分汇总情况一目了然：亨通光电孙群芳，慰问七都环卫所保洁人员加分，总分105分；西古光通于光，部分交办任务材料有遗漏扣分，总分98分。看得出，数据更新很及时，并非流于形式。

　　党建考核成为年终综合绩效一部分，是亨通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生产和管理的缩影。干实事是崔根良这些年对集团党委金融支部书记周健心最多的叮嘱：“一线员工越来越多，他们在生活、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很难了解到，要把党员联系群众的作用发挥出来。”为此，亨通首创了党员干部结对联系职工制度，规定从普通党员到支部支委，从车间主任到集团高管，每人都要结对联系一定数量的员工。如今，周健心与五位结对员工已成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

　　崔根良至今仍担任着集团党委书记。有朋友劝崔根良：“现在企业做这么大，你日常需要处理的事那么多，何必还要亲自担任党委书记？”崔根良诚恳地回答，“党建工作就是要一把手抓一把手。我不带头当书记，怎么体现党建工作的力度？”

　　在亨通光纤生产车间，筛选复绕机上醒目的挂着“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红色牌子。集团内1000多名党员就像1000多面旗帜，高高飘扬在集团各子公司内，成为各条战线上的先锋，“为集团奋斗，为党争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奉献”的信念牢牢扎根在每一个亨通人心中。

　　**有一种境界叫奉献**

**热心公益助推慈善 回馈社会共享“亨通”**

　　“企业小的时候是少数人的，做大了则是国家的。”凭借这句承诺，无论是乡土小厂厂长还是苏州地标型企业集团掌门人，崔根良都显示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大责任、大担当，担负起对企业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

　　吴江太湖新城菀坪社区武卫红家，简陋陈旧的屋子与崭新的电视、洗衣机、电冰箱形成鲜明对比。“崔总是大好人，面都没见过，却送了这么多贵重的电器。”武卫红双腿残疾，与88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生活条件不好，家里连件像样的家电都没有。

　　在吴江，像武卫红这样感受过亨通温暖的人不计其数。亨通慈善基金会连续五年开展的“助残圆梦行动”为吴江近千户困难残疾人家庭送去了495台液晶电视机、410台洗衣机和227台冰箱，使现代家电三大件覆盖全区贫困残疾人家庭。为了“授人以渔”，崔根良提出吸纳残疾人进厂从事力所能及工作的设想，二十多年来，亨通吸纳了2700多人次的残疾人进企业，目前，仍有300多名残疾人在公司工作。

　　崔根良不仅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也把大爱播向了中国大地。2007年，崔根良响应省政府号召，与苏北经济贫困村开展村企结对挂钩，进行长期扶贫活动，多年来，为八个贫困村新修了水泥路、桥梁、村部办公地及村民活动场所，累计捐资600多万元。2012年，亨通资助江西革命老区敬老院改造的“鹤轩安耆”项目正式启动，三年时间改造了井冈山、兴国、于都等革命老区25所敬老院，捐赠26辆多功能救护服务车，受益老人达3000多人。崔根良认为，革命老区为新中国作出过巨大牺牲，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老区人民的奉献付出。饮水思源，作为一名党员，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

作为国内线缆行业的领军者，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崔根良不忘回馈社会。为推动这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运作，2011年，崔根良捐资5000万元成立了江苏省首家由民政部直管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亨通慈善基金会，来帮助真正有困难的人。迄今为止，用于公益慈善累计捐赠超4.8亿元。崔根良也被授予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捐赠个人”、中国十大慈善家荣誉称号。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多往群众身边跑**

**——追记山西阳高县龙泉镇司法所原所长李培斌**

1月22日，山西阳高今冬最冷的一天，这天，是李培斌的百日祭。

李培斌是党的十八大代表，大同市阳高县信访服务中心原主任、龙泉镇司法所原所长。30年在基层工作，李培斌真诚做人、实在做事，严以修身、严以用权，被当地群众视为党和政府的好干部，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李司法”。

**30年调解数千矛盾纠纷**

在山西阳高县古城镇赵石庄村半山腰上的一处新坟前，司法助理员鲁学虎给师傅李培斌烧纸，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眼角的泪水瞬间结冰。

一晃三年，鲁学虎跟着李培斌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不管谁来司法所，不分高低贵贱，都一样给人让座倒水。不管家里有多忙，都是先顾大家再顾小家。

李培斌有句座右铭，“心装百姓事，胸怀为民情。”“一到基层，群众握着你的手，那种亲，那种情，不是有了金钱有了地位就能得到的。”小鲁说，“师傅常说，多帮一次老百姓，自有天降福。朴朴实实给老百姓干点事比什么都重要。”

30年来，李培斌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数以千计，制止了上百次群体性械斗，使50多个濒临破裂的家庭和好如初，使30多位遭受遗弃的老人得以安度晚年，让16位失足青年改邪归正……

2015年10月15日，李培斌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年仅50岁。消息传来，数万干部群众洒泪送别。

在南关种蔬菜大棚的村民何存爱，为了感谢李培斌早些年的调解，去了趟生养李培斌的古城镇赵石庄村，想让村民到自家地里免费拿白菜。见没人去，何存爱开着车把白菜送到了村里，结果还是没人要，那就卖吧，1块钱卖100斤白菜。何存爱说：“李所长在世的时候，一片菜叶子都不要我的，如今人不在了，就让老家的乡亲们吃上些吧。”

**为百姓办事再苦再累都是福**

基层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李培斌的调解工作为啥能比别人出色？他总觉得为群众多办事，再苦再累都是福，老百姓的事再小都是天大的事。

山西省政协社法委主任王水成与李培斌相交颇深：“培斌之所以受到群众欢迎，就是他把权力看得很淡，把群众的利益看得很重，始终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

60多岁的李兴国是龙泉镇南关村人，因为承包土地和村委会发生了纠纷，3年多时间都得不到解决。李培斌前前后后协调了20多天，终于妥善处理了问题。

李兴国说，每次来司法所，李所长的办公室都是挤满了人。但不管有多少人，他都一一登记处理。“李所长为我的事真是费了心！事后我就想，谁越给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越爱往谁那儿跑。我是个木匠，做活儿首先得过了自己的眼。我觉得李所长跟好木匠一样，为人处事人格第一、品德第一。”

村里人听不懂大道理，李培斌调解的时候，讲的都是大实话，跟人拉家常，都是将心比心。登门调解的时候，还不忘带点水果过去，特别重感情。

县里搞城中村改造，拆迁户许才在自家平房院里养了几十头猪，如果平房拆迁换楼房，没法养殖就断了活路，所以死活不肯拆迁。李培斌跑遍整个县城，帮他找到可以调换的合适平房，许才爽快地搬迁了。

30年基层工作，李培斌总结出“三心”“三勤”工作心得。“三心”，就是要有换位思考的同情心、高度负责的责任心、把小事当大事做的事业心。“三勤”，就是耳要勤，多听群众说话；嘴要勤，多向群众请教；腿要勤，多往群众身边跑。

**化解矛盾更要给人以温暖**

在李培斌的工作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些矛盾纠纷很特殊。矛盾产生了，而且很尖锐，而矛盾对立的双方却谁也没有过错。现实的无奈使矛盾的双方谁也不肯让步。调处这样的矛盾纠纷，这就需要我们调解人员的一颗热心，设身处地为矛盾双方着想，千方百计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龙泉镇富贵村的穷老太太袁桂如一生孤苦，先后送走了4位亲人——她的丈夫和3个儿子。六七年来，李培斌隔三岔五就到老人家里去看一看，锅里有没有米，灶前有没有柴，逢年过节还会送钱送物。

袁桂如的二儿子张建国服刑期间，患了脑萎缩，导致口齿不清楚，行动不方便。刑满释放后，监狱方用车把张建国送回家。可让监狱方没想到的是，袁桂如不让儿子进门，让他从哪来回哪去。

情急之下，监狱方找到司法所请求调解。李培斌急忙赶去了解情况，到了张建国家，贫困破败的家庭让李培斌心如刀绞。

老人泪流满面地对李培斌说：“儿是娘的心头肉，当妈的咋能不让儿子回家呢？可家里这情况，你也看到了，让我们娘儿俩咋活呀？”

李培斌擦了擦泪水，对老人说：“您先让儿子进家，生活困难我来想办法，党和政府不会不管您的。”

听了李培斌的话，老人搂住儿子失声痛哭。之后，李培斌多次与监狱方协商，为张建国解决了3万元医疗、生活费。他又向镇党委和县民政局作了汇报，为母子申请办理了低保，接着又是跑县残联办理了残疾人证，争取轮椅和资助。几经周折，终于使母子俩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化解了矛盾。

2012年春节，正当李培斌难得在家团聚时，袁桂如突然打来电话，说儿子去世了。李培斌二话没说，冒着严寒赶到40多公里外的袁桂如家，张罗后事。

“同样是化解一起信访案件，换成别人，可能当时息访了，事后又上访。李培斌在化解矛盾时，能给信访人以温暖，关心当事人的生活，后续回访，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王水成说。

（来源：人民网）

**黄志丽：法律大地上的守望者**

电影《知心法官》即将在全国公映。影片以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模范法官黄志丽为原型，讲述了黄志丽公正司法、司法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感人故事。

　　黄志丽是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21年间，她坚持用责任和爱心诠释法律尊严与温度，被老百姓亲切称为“知心法官”。

　　在黄志丽看来，法律是法官脚下最坚实的大地，而情和理是左右脚。只有坚守大地，大步迈开双脚，每一步才能走得坚定有力。

**铁骨法官，坚守公平正义**

　　“侠客仗剑走江湖，法官挥槌辨曲直。”1995年，文秘专业出身的黄志丽放弃高薪，报考芗城法院。经历了苦行僧式的“修炼”，半路出家的她，终于从一名政工科科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法官。

　　这个过程中，她对正义的理解，悄然改变。“法院不是江湖，快意恩仇不代表公平正义。”黄志丽说，“侠客主张锄强扶弱、扶危济困，但弱者并不一定有理。对法官而言，法律与事实之外，别无尺度。”

　　不久前，她审理一起快递纠纷案。一家种子公司委托某物流公司承运200公斤种子，后因种子丢失将其诉诸法庭。由于承运时未保价，物流公司只肯赔付200元运费。本案似乎又是一起因快递业霸王条款导致的纠纷。但经过调查，黄志丽发现，物流公司出具的委托书上有种子公司的章和经理刘某的签字，但名字是由他人代签的。

　　看来种子可能被冒领了。刚刚被种子公司辞退的员工小王，有重大嫌疑。为此，黄志丽费尽周折，找到了他。原来，小王与原雇主曾有押金纠纷，一时气不过，冒领了种子。一宗悬案尘埃落定。物流公司老板长舒一口气：“若不是黄法官细心，又要吃哑巴亏了。”

　　自2002年任助理审判员办案以来，黄志丽共审结民商事案件5199件，无一发回重审、无一撤销改判、无一申诉信访、无一投诉举报。光鲜的数据背后，是她对公平正义近乎严苛的坚守。“法官办案，莫被表象迷惑，应抽丝剥茧，追根溯源，让裁判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事实。”黄志丽说。

　　最初，书记员刘颖觉得，黄志丽总是给自己“找麻烦”。

　　“当事人缺席的案件是最省事的，但对师傅来说，反而要更费神。”刘颖说，开庭之前，她总会不厌其烦地致电当事人，提醒他们准时出庭，“只要一方当事人缺席，绝不轻易开庭”。

　　小蔡与小崔是安徽同乡，因借贷纠纷闹上法庭。小蔡手握8万元借条，称对方赖账不还。开庭时，小崔迟迟不现身。为此，黄志丽给他打了电话。电话中，小崔委屈地说：“我早已还了3.6万元，他却翻脸不认人，这笔钱留给他买药吃好了，算我倒霉，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于是，黄志丽不断给小崔做工作，不能感情用事，错失为自己辩解的机会。最终，小崔到庭。经比对收据，小蔡才发现自己记忆有误。

　　“程序正义是法律正义的重要环节，即使案情一目了然，也要确保当事人申辩的权利。这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节，而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石。”黄志丽常跟年轻干警们讲述“毒苹果”理论，“一个有偏差的判例，就可能摧毁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

　　法官办案，难免受到外力干扰。金钱诱惑、权势施压、人情牵绊乃至社会舆论的干预……面对干扰，黄志丽有自己的原则：有理不用说，没理说了也没用。回家途中遭遇当事人威胁，她义正词严地喝退了对方；对各路说客，她坚持简单的案子快审快结，不留下说情的时间差。

　　2010年，黄志丽办理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鉴定结果显示，原告身上两处骨折。但黄志丽依医院诊断书判断，其中一处或为陈旧伤，故主张重新启动伤残等级鉴定程序。若陈旧伤被坐实，赔偿金额将锐减。为此，原告找到黄志丽，言语间暗示自己的儿子为当地某局长。但黄志丽还是顶住压力，再次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结果不出其所料。

**知心法官，推动事了人和**

　　“黄法官，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阻止孩子他爸看孩子了。”从春天到冬天，经反复调解，小沈终于被黄志丽说服了。一年前，小沈与小钟闹离婚，孩子被判给女方抚养，小钟享有探视权。但一到周末，小沈就带着孩子玩失踪。这时，黄志丽介入调解，反复强调要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这让科班出身的书记员江晓筠很困惑。“只要公正判决，法官就已完成使命，为什么还要在槌外下这么多功夫呢？”

　　黄志丽给她讲了一个故事。早年，她承办一起兄弟土地纠纷案。由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黄志丽很快下了判决书。回访时，她却发现，案子结了，心结难开，90多岁的祖父抱恨而终。“一个猪圈毁了三代亲情！”

　　“时至今日，我依然愧疚，规则之治没错，但法律之外还有复杂的情感，一份无可挑剔的判决书，不一定能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黄志丽认为，审判之外，还应重视调解，耐下性子，做足释法析理工作。

　　2014年8月，南坑街道古塘村村民因土地征迁款分配，闹得不可开交。原来，按村规民约，外嫁女不能享受土地权益。但有40多个村民，虽已出嫁，却仍住在村里，丈夫、孩子也落户在此。她们坚持，拆迁款有自己的一份。

　　这时，黄志丽来到村里，把双方村民都喊来了。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千百年来，都是这理儿！”反对者咄咄逼人。

　　“从法律上说，他们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权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从情理上说，人家参与村里修路、修庙，每年祭祀活动的人头费没少交，给村里作了贡献，要分钱了，你们却把人拒之门外？”黄志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消除村民疑虑，她还翻出几份类似案例的判决书副本，张贴在村里的公告栏上。

　　经多次一对一调解，纠纷迎刃而解。40多个村民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款。

　　“我在进行调解时，常常灰头土脸，无功而返。”南坑街道副主任杨晓煌说，“黄氏调解法”不仅以理服人，还十分接地气，“上来就是一通闽南俚语，说到老人们的心坎里，不仅解决了纠纷，还普及了法律知识”。

　　“每一个法官，都向往天下无讼的桃花源。我希望每办理一个案件，能影响一群人，召唤道德回归，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黄志丽的脚下总是沾满泥土。

**牢记使命，守望司法春天**

　　今年“三八”妇女节这天，黄志丽放弃休息，来到东园社区“黄志丽法官工作室”，开展了一场妇女维权与反家暴法普法讲座。她通俗易懂的说法，不时博得阵阵掌声。

　　2012年6月，首个“黄志丽法官工作室”成立，零距离提供法律服务。如今，工作室增至5个。几年间，工作室累计为群众答疑793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29次，诉前化解民事纠纷1132件。

　　“对许多老百姓而言，打官司并不容易，要么交不起诉讼费，要么连法院的门往哪儿开都不知道。”黄志丽说，这两年，自己把更多精力投入法官工作室，试图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司法服务路径。“我一直在思索，什么样的案件可以在工作室先行调解？什么样的当事人在工作室得到帮助，比在法院更便捷、高效？”

　　在审理好每个案件的同时，黄志丽希望能为司法建设贡献一己之力。“司法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作为法律工作者，有责任为司法的春天而努力。”正是出于这份使命感，多年来，虽然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法官工作辛劳繁重，黄志丽依然坚守不移。

　　2005年，黄志丽的母亲重病入院，3个月花了18万元，其中自费12万元。当时，12万元在漳州市区可买一套大房子。黄家经济压力不可谓不大。就在这时，有企业抛来橄榄枝，欲高薪聘请黄志丽担任法务，黄志丽却谢绝了。这让身边的朋友难以理解：“如今你声名在外，还傻傻地领着三四千元的月工资。以你现在的名望，随便坐镇一家律所，就是活招牌，价码任你出啊！”黄志丽却说：“老实说，心中也曾犹豫过。但我们这个年纪的法官，正是挑大梁的中坚力量，若都走了，基层司法工作还怎么开展？既然选择留守，就要甘于清贫。”

　　司法的春天，需要接力者。作为老法官，黄志丽把传帮带融入日常工作中。“小年青们大多科班出身，专业素养不成问题，但因缺少人生阅历，在深入基层、与老百姓打交道方面，欠缺火候。”为此，黄志丽言传身教，“农村老阿婆握你的手，你不能嫌弃，任何嫌弃的表情都不能有。年轻人可能会闪得远远的，这时我就要做表率。”

“我不希望大家都变成黄志丽，而是希望超越黄志丽。”如今的黄志丽已是个名副其实的“名人”。面对荣誉，她有着不一样的理解，“这些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而是基层法官的共同荣誉，我要坚持的是更好地把握手中这把判断是非曲直的尺子”。

（来源：中国文明网）

**44年把百姓的事刻在心上**

**——追记“时代楷模”燕振昌**

1月31日，中央宣传部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时代楷模”燕振昌的先进事迹。燕振昌，河南省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原党委书记，44年如一日带领全村干部群众脱贫致富，把昔日的贫困村建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2014年12月12日凌晨，燕振昌因操劳过度导致突发心梗，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直到生命终止的前一天，他还带着调研组去参观奔波6年才引回来的幸福湖水。生命终止的前一晚，还打电话给3个班子成员，细心地交代第二天要去办的几件事。

　　生命终止的那一刻，这位在基层党工作了44年的老党员，还伏在办公桌上，准备写下当天要办的事。然而，工作安排写到第4项......却戛然而止。燕振昌再也没有醒来，留下的是整整94本工作日记，这是一位老党员忠诚党的事业最好诠释。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农村也能干出个名堂”**

　　1962年，20岁的燕振昌高中毕业，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回到了家乡。因为有文化又肯干，1967年就被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长，短短3年后又当选为村支部书记。

　　当时的水磨河村人多地少，没资源，无产业，社员穷得吃不饱饭。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水磨河，水磨河，磨来磨去，灾祸多,十年种地九年荒,男女老幼掉苦窝。那时，燕振昌立志“在农村也能干出名堂”，决心改变家乡的面貌。

　　没想到这一干就是44年，期间，燕振昌有数次脱产当国家干部的机会，都没有动摇他在家乡干事创业的决心。他曾在日记这样写：“再大的官也是为人民服务，在农村也能干出个名堂，能为水磨河老少爷们办点实事，就是我的用武之地。”

　　1970年燕振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合计办集体企业，给大队多产东西，多攒点钱。几年间，他领着社员办起了农机配件厂、面粉厂、冰糕厂、机瓦厂。随后，又建起了白灰窑、砖瓦窑，成立建筑队和石工队。到1981年，水磨河村已拥有十几家集体企业，每年给村里交利润30多万元。

　　1986年，国家开始鼓励办“股份制企业”，燕振昌嗅到了经济改革的信号。当时，省内还没有创建成功的先例，燕振昌带领村“两委”建起了水磨河村造纸厂，这不仅是长葛第一家、也是河南省第一批股份制企业。

　　随后几年里，村里吸收股金800多万元，办起了铸钢厂、淀粉厂、瓷厂等股份制企业，涌现出了机械、加工、商店、运输、饭店等私营企业50多家。昔日的穷乡村一跃成为长葛市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超亿元的“明星村”。

　　坡胡镇党委副书记刘示祥回忆说：“那时，燕书记常跟大家说，政治过硬是硬本领，带头赚钱是真本事。又能服务又能致富的村干部，才是真正腰杆硬的好干部。”。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水磨河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富裕村。到2014年，水磨河村总产值突破4亿元，80%的村民都能在村办的厂里就业。村民们感激现在的生活：“依靠党员能挣钱，每月工资二三千，干活办事不出村，感谢党员想着咱”。

**“敢想敢干，一心为民，千难万难都不让群众为难”**

　　“群众的事就是咱们自己的事，当村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干部千难万难，不能让群众为难。”燕振昌的心里埋着一个愿望：我也想在有生之年，把水磨河打造成第二个华西村。

　　上世纪七十年代，水磨河村已有3500多口人，村内道路狭窄、弯曲、泥泞，五户一院、三代同室比比皆是。当时村民反映问题最多的就是住房问题，经过村党支部开会研究，结合水磨河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燕振昌琢磨着建水磨河新村。

　　在那个时期，找不来规划师，没有规划图，燕振昌就和村里的泥瓦匠在地上用石子摆出来全村的新村布局。从1976年至1986年，平寨墙，填坑河，扩大宅基，用统一规划，全村1000户人家的住宅重新进行了安排。

　　如今，走进水磨河，就像进了城镇一样，一座座两层高的民居整齐排列，大街小巷硬化、绿化、亮化一新，暖泉河水环绕整个村落，还建成了村卫生所、文化广场、生态园……水磨河农民的生活让人羡慕。

　　乡亲们还记得，2008年底，全村浇灌农田的幸福湖的水莫名其妙的没了，连村里100多米的深井也抽不出水来，大家只能到二里地外的发电厂拉水吃。幸福湖的水“蒸发”，导致附近3个乡镇、23个村、近4万口人的吃水和灌溉出现严重困难。

　　村民急了，作为全村的“当家人”燕振昌更是急在心里……他给村里人立了军令状：“我当书记时，幸福湖有水。我不干了，湖里还得有水。无论多难，都得给子孙后代留一方清水。”

　　水究竟去哪儿了？经过多方考证后发现，水磨河村的水凭空消失，而南边的龙屯煤矿却在用4个大水泵24小时不断往外抽水。燕振昌推断，应该是龙屯煤矿透水事故,导致幸福湖水及地下水全部干涸。

　　为从根本上解决水源问题，年近七十的燕振昌开始不断向上级打报告。2013年10月，长葛市西部引水灌溉工程正式得到批复——该项目通过引平禹一矿矿井排水入长葛，注入幸福湖，解决了坡胡镇、后河镇、石固镇灌溉水源问题，同时配套建设2.56万亩田间灌溉工程。

　　如今，幸福湖再度盈满，燕振昌没能喝上甘甜的湖水。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看到村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看到村里的事业一天天发展壮大，我就有一种成就感，要不我党心不安、良心不安哪！”

“我们这一方人都是他救活的。”村民张海林说，“我们村里人坐在一块儿就议论，这功劳就是他燕振昌的，换了谁都不中。”提起这事儿，妻子张改真忍不住夸他：“他决心可大，敢想敢干敢闯。这一辈子，他想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功的。”

**倡导新风，弘扬正气，把为村民服务当成“座右铭”**

　　“钱不沾边、物不沾边、奖金不沾边、烟不沾边、红白喜事酒场不沾边、村里的工程亲戚不沾边。”燕振昌的女儿燕新红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村里的事，啥都好说，坏规矩的，怎么说都不行。”

　　燕振昌不抽烟，这一点水磨河村人都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年轻的时候，烟瘾也很大。戒烟，始于30多年前。

　　1976年，燕振昌开始带领村民建设新村。一些心思“活络”的村民开始给他送烟抽。“我戒烟了。说事可以，但烟你得拿回去。”谁能想到，从那时起，几十年来燕振昌竟再也没有抽过一根烟。

　　直到燕振昌去世，翻阅他日记时，女儿才了解父亲当时戒烟的真实意图。他写道：“就这一根烟，不仅坏了规矩，也给村民原本就不富裕的日子增加了负担。因为自己的习惯让村民破费，太不应该。这烟以后不能再抽了。”

　　当村干部几十年，燕振昌家里的亲戚朋友没沾上一点光，为此得罪了不少亲友。“我结婚的时候，一个经常来往的亲戚都没有参加，因为当年新村规划时，他想多盖一间房，父亲怕影响新村规划，就坚决不同意。”

　　燕振昌作为“班长”，做事历来是非清楚、不和稀泥、也从不搞特殊。一直倡导村两委班子是“大家说了算、有事不隐瞒”，每有大的决策，他总是和班子成员充分协商沟通，按“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严格操作执行。

　　为了督促村务公开，燕振昌创造性地实行了“腊八算账”。四十多年里，每年“腊八”公开村里的收支情况，表决通过党支部下年度事务的预案。账目公开了，群众心里亮堂了，对干部也信服了，来年该干啥不该干啥让大家心里有数。

　　燕振昌不仅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他还一直倡导尊师重教、孝老爱亲的社会风气。每年8月28日，当年考上学的学生和家长就会被一起请到村委会，给他们披稠戴花，沿街一路敲锣打鼓。还给孩子们送路费、书籍等，这已经坚持了30年。

　　为了让村民真正重视教育，燕振昌还带领水磨河村两委8次建校：1983年，水磨河村建起了全市第一幢百米长廊教学大楼；2004年，建成了全市第一所农村封闭式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以后，水磨河村考取大学本科以上的学生达460名之多。

重阳节表彰“好儿子”“好媳妇”，给全村7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贴，建成了全省第一家村级敬老院......如今，水磨河村小孩儿比争气、媳妇儿子比孝顺、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老党员44年诠释信仰的力量**

　　在日记本扉页上，70来岁的燕振昌用最工整的字体，重温了“入党誓词”。他写道：组织和村民这么信任我，没有理由不好好干，如果我能再年轻上十岁，我会为水磨河村办更多的事情”。

　　早上4点起床，写工作日记、考虑一天的工作，6点准时召开村两委会议，7点半结束。不管刮风下雨，燕振昌几十年如一日。晚饭后，燕振昌会骑着自行车到村里转一转，处理一些事务。他曾说：“咱不能坐在村里等群众找咱，咱得主动下去，遇到啥事随手就给他们解决了。”

　　他的书柜里，整齐摆放着94本工作日记，从1972年直到他生前最后一刻。七十年代，记录最多的是积肥、种粮、养殖、抗旱等关于农业方面的事儿。到了八十年代，记录最多的是如何建设新村、发展经济、带头办企业，咋让水磨河的乡亲们吃饱、穿暖、富起来。

　　村委干部韩会军到现在还记得刚到村委上班时，燕书记的一番话：“党员干部不是享福，是服务。不管找到谁，不管是好事、缠手事，咱都得做到不推托，能听响，有着落。我的座右铭就是为咱水磨河村老少爷们服好务。”

　　2014年12月11日晚上，吃罢晚饭，妻子张改真看着燕振昌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病了，要不咱们明天去检查一下。”燕振昌说：“我欢吃欢喝地，能有啥病！”接着又说“村里的事还没有忙完”，就扭头走了。

　　第二天凌晨5点多，燕振昌突发心肌梗塞，累倒在了办公桌前。去世时，日记本依然摊开着，一如往常地记着头一天的工作和当天的安排，当写到第四条时......他却永远地离开了。

　　燕振昌走后，他的事迹被全国多家媒体相继报道。燕振昌走了，他的精神从未离开。

　　合上日记那一刻，女儿燕新红泪流满面:“那一本本写满了村里大事小事的工作日记，竟没有一句是留给女儿和家人的！”万万没有想到“村里的事还没有忙完”竟然是燕振昌留给家人的最后遗言。

　　水磨河村村民张大强至今还记得送燕书记走那天的情形，满街自发为他送行的村民一路跟随，平日热闹的大街安静的只能听到村民的哭泣声。“哭声阵阵，有的拿手擦着眼泪，有的拿袖子抿着，那些和他相熟几十年的老人们，捂着嘴哭得止不住声儿。”

　　送燕振昌走的那天：依照他生前在村里立下的规矩，婚丧嫁娶不大操大办、吃吃喝喝，办白事儿更不能请人“吹响器”。当天送别老书记的路上，没有响器班儿。遗体告别仪式上，经许昌市委批准，燕振昌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

　　领导、亲友、乡亲们送来的慰问金，儿子燕松涛把能退的都退了，不好退的就由张改真做主，连同上级发放的抚慰金一起为村里成立了“振昌惠学基金”。

　　燕松涛说：“如果父亲生前有交代，也一定是让这么处理的。”

老燕去世后，张改真时常会想起了两口子年轻时的对话：“当年他说过，在农村也能干出个名堂，让我放心。他就是个有决心的人，说到的都做到了。”

（来源：人民网）

**尕布龙：“牧民省长”时代楷模**

　　2011年10月8日，寒露，一位老人走了。2014年，《西宁晚报》推出评选影响青海历史人物活动。短短几周时间里，晚报热线电话响个不停、微博留言不断、信件纷纷而至……先后有3000多位市民不约而同地向报社推荐他。这位老人，就是蒙古族共产党员、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18年奋斗，给西宁百姓留下了郁郁葱葱的南北两山；30年坚持，将自家房子改成“牧民店”，让许多农牧民在省城多了个“家”；50年的奉献，走遍青海的山山水水，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里……他用质朴和执着，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一个“牧人公仆”的赤子情怀——追记蒙古族共产党员、青海省原副省长尕布龙实干本色他是青海的“忙活人”，哪里工作最苦最累，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在担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22年间，尕布龙很少待在机关，一有机会就往乡下跑，一年要跑五六万公里，几乎每个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他车后备箱常年装着一些劳动工具、一床狗皮垫子、一袋白面、一袋青稞面，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睡到哪里、吃到哪里……

　　“下乡时，他经常半路下车，绕道步行，走帐篷、串牧户。”曾任尕布龙司机多年的催生满说。

　　1990年春，尕布龙前往海东地区(今海东市)民和县满坪乡调研扶贫。

　　在一间破旧的茅舍前，一位农民把他引进屋。这是河口村的陈老汉家，眼前的一切，让他心痛：

　　窗户残破，四面透风；土坑上的毛毡，满是虫蛀鼠咬的窟窿；墙根儿里的被子，旧得辨不出颜色……

　　回到西宁，尕布龙彻夜难眠。河口村的所见所闻，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头。第二天一早，他就让司机将家中的六床新被子给陈老汉送去。

　　“把新被子全拿走了，家里来人盖什么呀？”司机问。“我们的困难好克服，先帮助群众最重要。”尕布龙说。

　　此后几年，尕布龙先后帮河口村解决了灌溉、通电问题，还引进了蔬菜种植等多个扶贫项目。如今的河口村早已摘掉了压在头上多年的“贫困帽子”。

　　辽阔草原，见证他成百上千次艰苦跋涉化解扶贫难题；连绵大山，记住他不知疲倦翻山越岭改善学校条件；奔流湟水，难忘他不计其数地下乡调研关心生产发展……

　　1985年冬天，一场特大雪灾袭击青南高原，2000多户人家断粮。

　　时任青海省副省长的尕布龙已经年近六旬，身边很多人都劝他：“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别去一线了。”

　　他哪能坐得住，二话没说便跳上连夜赶赴玉树救灾的汽车。

　　5300米的指挥部前线，积雪足足有一米厚，通往乡村的道路全都被封死。

　　“群众都脱险了，再回去！”

　　搬草料、运燃料、安置群众、转移牛羊……尕布龙和大家一起在高原上扛了一个星期，直到晕倒在现场。

　　“怎么劝他也不听，那是累的啊！”时任玉树州曲麻莱县农牧局局长的阿旺尖措说。

　　当尕布龙撤下来时，他脸色发紫，感冒引起的肺气肿险些要了他的命。

　　有人说，只要有工作，尕布龙就往前冲，就像一头老黄牛，几个人拉也不回！

　　1993年，尕布龙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卸任。老黄牛似乎可以休息了。

　　然而，命运却给他安排了另一种生活--种树。同年，他被任命为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

　　“青海好，青海好，青海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青海生态独特而脆弱，特别是环绕西宁市的南山和北山，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

　　让南北两山变绿，谈何容易？

　　“有人说种不活树，那我就种给大家看！”退休第二天，“不信邪”的尕布龙扛着锄头带人上了山。

　　他决定先在西宁市北山的大寺沟和韵家口两地画出3块示范区。从那时起，他就“泡”在了山里。

　　早上六七点他就开始挖树坑、抬树苗；中午就在山坡上和工人们一起啃点干馍馍、喝点茶；晚上实在太晚了，就在山上凑合睡一宿……几年下来，原本寸草不生的大寺沟，被成片的红柳林覆盖；原本是乱坟岗的韵家口，也建成了60多亩的苗圃基地。

　　尕布龙心里乐了，大家心里也敞亮了。

　　紧接着，他像上足了“发条”似的，又开始带领大家制定南北山绿化的长远规划。

　　根据西宁气候干旱、土壤缺墒的特点，尕布龙提出“以水定林”的思路，即规划绿化项目时，第一年先动工水利工程，第二年再整体造林。

　　看到南北两山一年年绿了起来，尕布龙更来劲儿了，他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山上，与山相伴。

　　有一年春天，风很大，尕布龙带着工人到韵家口苗圃挖红柳苗。收工时，人们发现他不见了，便急忙四处寻找。

　　原来干了一天活儿的尕布龙实在太累了，靠在苗圃的地埂上睡着了，身上、脸上、耳朵里、鼻子里全是沙土。

　　“他就是这么个人，心里只装着公家和百姓的事。”海晏县原工商局副局长宁克利回忆道。

　　从1993年开始植树直至2011年去世，尕布龙在南北山林区的劳动日多达3000多天，就连每年大年初一至初三，他都亲自上山值班，从未间断。

　　18年来，他带领大伙儿植树造林3.75万亩，栽树近3000万株……如今南北两山的森林覆盖率由当初的7.2%提高到现在的75%，成为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2009年6月，重病缠身的尕布龙住进了医院，他再也不能往山里跑了。医院专门给他挑了一间能看到北山的病房。

　　为民本色他是百姓的“知心人”，只有干部多走“操心路”，百姓才能多走“安心路”

　　“别叫我省长，我就是个牧民。”

　　那些年，从草原的这一边，到大山的那一边，尕布龙一直是百姓的“知心人”。

　　从20多岁担任县领导到后来任州领导、省领导，尕布龙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与百姓打成一片。

　　退休以前，他每年春节回老家都会帮家中老人、小孩多的牧民放羊，好让辛苦一年的乡亲过个团圆年。

　　青海的冬天，滴水成冰。他总是每天早上七点出去，晚上八点多了才回来。冷了，他就在背风地儿躲一会儿；饿了，就啃几口“冰馍馍”；困了，他就在“冬窝子”里眯一会儿……

　　有人说，何必如此讨苦吃？

　　“不知道老百姓甘苦的人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而只有像老百姓一样艰难地生活和劳动过，才能体会老百姓的甘苦。”他讲道。

　　在别人眼里，他活得太累，每天都有办不完的事，帮不完的人。但在他眼里，这是不忘本，是在报恩！

　　1926年，尕布龙出生在青海省海晏县一个贫苦的蒙古族牧民家庭。

　　长大后，他给牧主头人家放过羊，当过民夫、干过苦力，与草原上大多数农牧民一样，一直在苦难中度日。

　　那天，共产党来了，解放军来了。他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

　　1952年6月，26岁的尕布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将尕布龙送到高等学校培养。

　　1971年，尕布龙担任青海省委常委、省畜牧局局长，他的家也正式安到了省城西宁的畜牧局大院。

　　尕布龙“喜欢管闲事”，没有官架子，他对老百姓好早已名声在外，许多到西宁办事或看病的贫困农牧民群众，都会找上门到他这儿落个脚、吃个饭，他的家也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牧民店”。

　　当时，尕布龙住在畜牧局的平房里，家里没有沙发，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只是在各屋里摆了十几张简易的板床，家里每天都吃住着少则七八位，多则几十个来自各地的农牧民群众。

　　有时候，房间里实在住不下了，就在院子里搭几个帐篷。

　　有人问他：“这些人是你的亲戚？”“不是。”“那是熟人？”“也不是。”“那你们认识？”“不认识。”

　　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他乐此不疲，每次有农牧民远道而来，他都像见了久别的朋友，问寒问暖。

　　“他不仅一分钱不收，还出钱帮忙。”曾任尕布龙秘书的袁兆盛感慨道。

　　一次，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藏族牧民的孩子患上了急性脑膜炎。

　　尕布龙马上联系医院。在连夜抢救的十几个小时里，尕布龙就像守护亲孙子一样，一直在抢救室外面焦急地等着，直到孩子转危为安。

　　“尕省长，是你救了我孩子，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根子啊！”孩子家人激动地拉着尕布龙的手，边说边流泪。他却说：“是医生救了你孩子，要谢就谢党和政府吧！”

　　尕布龙常说，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为了照料好农牧民的生活，尕布龙家里常年生着煤炉子，每天要做5锅面条，每月要买两三百斤面粉，每年要烧五六吨煤……

　　今年81岁的蒙古族牧民彭措上世纪70年代曾在“牧民店”当过3年厨师。

　　“人多的时候，家里架着3口大锅，几拨人得轮流吃饭。尕大哥和大家一起吃，从来不开小灶。”彭措说。

　　1979年，尕布龙担任青海省副省长，按规定要搬进通水通电的省政府家属楼。他却很不情愿，仍坚持住在畜牧局的平房里。他担心省政府家属区进门要登记，农牧民大多不识字，来找他就不方便了。

　　直到1988年，青海省政府办公区与住宅区分开，尕布龙才搬进了政府住宅楼，“牧民店”也随之搬了进去。后来，他又搬到了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家属院，“牧民店”继续如影随形。

　　盛夏寒冬，周而复始。30多年来，尕布龙的“牧民店”迎来送往着一批又一批农牧民群众，总数不下六七千人。

　　“我是从金银滩草原一路走来的放羊娃，是人民养育了我一辈子，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他说。

　　尕布龙走了，而一个共产党员真挚而坚定的为民情怀，永远地留在了大家的心中。

　　党员本色他是干部的“引路人”，百姓用他量出干部的“高矮”，干部用他感知百姓的“冷暖”

　　“他天天穿着蓝大褂，啥时候都是半腿的泥，身上也是土，跟我们一样。外人不知道他是省领导。”北山护林员段国禄回忆道。

　　为了能帮助更多的人，尕布龙对自己“抠门”得厉害：

　　他平时经常抽四五块钱的劣质纸烟，蓝布大褂已经洗得发白，衬衣上打着补丁，唯一一件呢子料的中山装穿了十几年……

　　有人劝他：“你是省领导，总得多买几件上得了台面的衣服吧？”“比起草原上的牧民，我已经穿得够好了。”他说。

　　尕布龙对饮食的要求更是简单：早饭只要有酥油炒面、馍馍和熬茶就可以，最多一两个月出去买几根油条；午饭通常是土豆、萝卜、粉条炖成的大锅菜就馍馍；晚饭基本上就是煮点面片……

　　由于他平时帮助的人太多，遇到钱不够的时候，得向身边的司机、秘书借钱。

　　尕布龙不仅对自己“抠”，要求还特别“严”：

　　他下乡，总是和秘书、司机同住一屋，不住单间。

　　吃饭更是越简单越好，一般只要面片和牧民们常喝的老茯茶就行。每次下乡吃饭，都要付钱，而且司机、秘书也要各算一份。

　　有时候，为了不给基层干部群众添麻烦，干脆就用开水泡馍馍凑合……

　 上世纪80年代末，尕布龙去大通县桦林乡调研。临近中午，一位乡干部向另一位干部挤了一下眼睛，那位干部就会意地去准备午饭了。

　　“你们眼睛挤什么？”尕布龙发现后问。乡干部说：“我们准备了只尕羊，想赶紧宰了做饭。”“这样挤眼睛，一年要挤掉多少只羊哩？”尕布龙说完便起身离开，执意到附近小饭馆去买饭吃。

　　乡干部只得赶紧按他的意思去做了一锅面片。

　　有一次，他在一个村子里搞调研，中午在村干部家吃了一顿家常饭。他要付钱，村干部说什么也不收。

　　他没办法，只好先离开。但是车刚刚开出村口，他就将算好的20多元饭钱让司机送了回去。司机说：“为了这么几个钱来回折腾，值么？”

　　“账不能这么算！领导干部多吃多占养成自然，就会败坏党风，丧失民心啊！”尕布龙义正词严地说。

　　在别人看来，他的“严”有时候近乎“不讲情面”：

　　1991年，海南藏族自治州举行青海省州地市人大工作联系会。开会前，尕布龙让秘书告诉会务组，饭菜越简单越好，一律不准上烟酒饮料。

　　结果在会议结束那天，饭菜比前几天好了些，还上了烟酒。他一进餐厅立刻脸色铁青：“同志们呐，南方一些地方正在遭受洪灾，但我们还在这里大吃大喝，能吃得心安吗？”

　　后来，桌上的烟酒、饮料及大部分菜品被撤下，尕布龙还是让会务组按照全部菜品价格，认真清点折算，由吃饭的每人平摊，把钱全部捐给南方灾区。

　　“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如果人人都吃饭不给钱，就会‘吃’坏风气，就是大问题了！”他说。

　　尕布龙不仅对自己“严”，对身边的人要求也很“严”：

　　“凭你自己的本事去做事，走个‘后门’帮你去求人，这个没有。”在尕布龙女儿召果力的记忆里，这是父亲对家人常说的话。

　　他一生没有亲生儿女，身边的一双儿女是他的养子和养女。1990年，尕布龙的大外孙东主仁青报考中专，仅仅差了2分。当他怯生生地向外公求助时，却吃了闭门羹。

　　知道外公脾气的东主仁青，选择了复读，并于第二年考上青海大学医学院专科。毕业后，分配到海晏县甘子河乡的一个砂场当修理工。

　　“当时，省城好几家大医院的领导主动提出东主仁青到他们医院工作，学以致用。”曾经当过尕布龙司机的杨杰说。

　　“上面分配他到哪里，就在哪里干。”尕布龙婉拒了大家的“好意”。

　　“人不能只顾自己家，要多为别人家想想。”

　　他在西宁连间房子也没留下；他的儿子尼玛才仁至今仍是一所高校保卫科的普通干事；女儿召果力刚刚结束几十年的牧民生涯，在海晏县城租了一个摊位卖馍馍；小外孙道日杰加木措依旧在草原上过着放牧生活……

　　尕布龙，一个总想“对自己更严一点儿”的共产党人。

　　在他人生最后的两年时间里，医院的楼道里、走廊上每天都挤满了来看望他的百姓，他关心、帮助过的人们把发自内心最深处的祝福给他。

　　尕布龙走了，他留下话：后事一切从简，不能收受任何财物，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例外……

　　成百上千的老百姓千里迢迢、扶老携幼，为他送行……

　　尕布龙走了，他两袖清风离开了这片他热爱了一辈子的草原、青山、土地，却留下了让子孙后代们“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深情嘱托，留下了老百姓心底由衷的敬佩和赞叹，留下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卓然风范……

“清廉表率尕布龙，为党工作几十年；百姓个个夸不停，他成了感动青海的尕老汉……”一首“花儿”小调传遍了青海，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来源：新华网）